

苗楚文化研究

李建国 / 蒋南华 ● 著



.6

贵州人民出版社

李建国 蒋南华 著

苗楚文化研究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吴家莘

封面设计:石俊生

版式设计:闵英

苗楚文化研究

李建国 蒋南华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1)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 10.5 印张

字数:224 千字

1996 年 5 月第 1 版 199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7—221—04077—X/G·1689

定价:12.00 元

序 言

王朝文

远在商、周时期,三苗的主要部分,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其他民族融合,被称为“荆楚”,又称“南蛮”、“荆蛮”。其后,荆蛮日渐强盛,发展为春秋战国的“五霸”、“七雄”之一的楚国居民。是时的文化被称为“荆楚文化”。

距今五千多年前,苗族的先民——“九黎”部落,自涿鹿战败以后,由黄河中、下游辗转于长江中、下游一带,即《韩诗外传》载的:“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指的是洞庭湖与鄱阳湖之间的沿岸一带,这不仅是楚国民族的疆域,也是古三苗的栖息之地。由此看来,苗、楚民族不仅在地域上毗邻交错,而且在语言文化方面,也有着一脉相承的内在关系。范文澜先生说:历史上楚国的文化是苗族文化的延伸和发展,是有据可依的。

苗族的原始文化是从对自然社会现象的各种幻影,所作

的朴素的构想而形成的巫术,进而萌发为对宗教、鬼神的说唱的巫文化。有的发展成祭坛和祭坛词,如《祭天祭地词》、《祭山祭水词》、《祭祖词》、《驱邪禳鬼词》、《招魂词》、《楚中曲》和《哭丧歌》等。《苗族古歌》是一部集巫词、集现实与浪漫为一体的反映古代社会变迁的长篇巨著。以后又派生出判断是非的《贾理词》和富有现实反抗精神的各类长篇叙事诗。

距今两千多年的屈原的代表作《楚辞》,与巫歌有着一定的关系,这在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九歌序》中已明确指出:“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因为作‘九歌’之曲。”所谓巫歌,其实也是带有巫术幻想的民歌。其调低沉激越,是为楚国盛行的“巫音”、“巫风”。苗族巫词、祭词也是其中有代表性的。

诚然,《九歌》是以巫为歌舞主角的。《招魂》与《大招》用巫术来招引人的魂魄,与苗族的《招魂词》几乎可画等号。《离骚》中写到巫咸降神,灵氛占卜,《九章·惜诵》中写到厉神占卜,《天问》有许多怪异的传说,《远游》有飘飘欲仙的境界,这些现象,都能证实《楚辞》与“巫术”、“巫歌”如出一辙。

春秋战国以后,楚文化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并行诸精彩的书面文学。在《楚辞》中无情地谴责楚怀王绝齐亲秦的投降主义,而具有现实的反抗精神。苗族由巫术发展起来的近代和现代口头文学,也充满了强烈的反抗精神,两者都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积极探索苗、楚文化之秘,而我省社会科学工作者李建国和蒋南华先生,经过多方面的研究和考证,写出《苗楚文化研究》一书,无疑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书

中,将苗族世代传承的巫、神文化以及口头文化,与楚文化进行系统的对比研究,从中分析其民族的亲缘关系和文化哲学基础,寻绎两者在历史进程中的嬗变,促进苗、楚文化及各民族文化的相互理解和交流,将有助于推动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

愿《苗楚文化研究》一书,能赢得广大读者、学者、专家的关注与支持。

1996.4

(作者系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

8098166

98
4281.6
16
2

目 录

序 言.....	王朝文(1)
第一章 苗楚文化的亲缘关系.....	(1)
第一节 远古传说与考古依据.....	(1)
第二节 苗族的民族渊源.....	(7)
第三节 楚族的民族渊源	(12)
第四节 苗楚民族亲缘关系寻绎	(17)
第二章 苗楚文化生成论	(24)
第一节 苗族文化的哲学生成	(24)
第二节 楚族文化的哲学生成	(33)
第三节 苗楚文化哲学生成之比较	(42)
第四节 苗楚文化：南方文化的典范.....	(49)
第三章 苗楚神话的历史演变	(60)
第一节 试析苗族神话的内在结构	(60)
第二节 试析苗族神话的崇高美	(70)

第三节	屈原中南北神话的交融	(83)
第四章	巫风巫俗及其时代特点	(92)
第一节	苗巫中的神秘文化	(92)
第二节	屈原信巫与苗俗	(103)
第三节	苗楚巫风之比较	(108)
第五章	苗楚民族的人文主义传统	(119)
第一节	苗族是有典型意义的民族	(119)
第二节	没有文字传承的灿烂文化	(126)
第三节	论《天问》的人文主义色彩	(134)
第六章	苗楚文化的伦理思想	(143)
第一节	苗族曲艺“嘎百福”伦理思想辨析	(143)
第二节	论苗族传统的伦理观	(154)
第三节	屈原创作中的女性色彩	(164)
第七章	苗楚文化的民风民俗	(176)
第一节	论苗族风情与口头文学	(176)
第二节	《九歌》与苗族民俗	(184)
第三节	简析屈原的“美人”形象系列	(199)
第八章	苗楚文化的审美追求	(209)
第一节	屈原意象论	(209)
第二节	《离骚》的表现主义文学体系	(221)
第三节	苗族远古诗歌的意境形态	(229)
第四节	苗族口头文学的“心物交融”说	(238)
第九章	苗楚文化的杰出贡献	(249)
第一节	论苗族传统文化的民族精神	(249)
第二节	屈原:继往开来的爱国主义精神	(260)
第三节	屈原与楚国历法	(272)

第四节 屈骚与苗歌——两种传统文化之比较……	(281)
附一：论文三篇	(291)
略论上古南方文化渊源及其文学艺术的风格特征	(291)
试论苗楚文化的历史渊源关系.....	(301)
炎帝——南方民族的始祖.....	(311)
附二：主要参考书目	(324)

第一章 苗楚文化的亲缘关系

第一节 远古传说与考古依据

楚、苗民族之族源及苗族的文化问题是千古文化之谜。破译这千古之谜，一方面是极力寻找楚、苗民族及其文化的事象，一方面是根据现存资料，由其种种蛛丝马迹加以推论，在据此所形成的各种说法的争论中，逐步得出符合其原有存在的结论。

有关楚苗民族的族源及其古老文化的种种说法，已作为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呈现在读者面前，如：

关于楚族——

有人认为楚族是夏代的遗民。依据是，楚之先祖与夏代禹部同祖同时同部落联盟，还有共同崇拜“熊”图腾的文化现象。^①

有人认为楚族属于古苗族。依据是：（一）苗族的祖先是传说中的三苗，而三苗的居住区正是楚人的居住区。《战国策·魏策一》中说，三苗居住在“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这一区域内（笔者按：这里的方向有误，《韩诗外传》将它纠正为“有三苗氏，衡山在其南，文山在其北，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彭蠡即鄱阳湖。楚国当时也是居住在这一区域。（二）楚人与三苗同祖，他们同是九黎（即重黎）之后，在《国语·楚语》中关于“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和《国语·楚语》注中关于“三苗，九黎之后”的记载，说明了三苗源自黎氏。而《史记·楚世家》载：“楚之先祖，出自……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重黎吴回是楚的先祖，因而，三苗与楚同一宗祖——黎氏。（三）《后汉书·西羌传》载：“及武王（周武王）伐商，羌、髡率师会于牧野。”章炳麟《检论·序种上篇》说：“今之苗，古之髡也”。由此可知，参加武王伐纣的髡人即为苗人，即楚族的先人。因为髡人这次作战有功，周成王才封髡人的子孙。“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史记·楚世

① 夏剑钦：《也谈屈原的族别问题》，《江汉论坛》1982.5。

家》)。

关于苗族——

这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大部分居住在贵州省,其余分布在湖南、云南、广西、四川、广东和湖北等省(区)。解放后,从贵州、云南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看,它与我国各地旧石器时代的文化有着相通之处,即石片石器在遗物中占绝对数量。这说明,西南地区的一些原始人的祖先,包括苗族的祖先,曾经在这里生活着。这为苗族族源的土著说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没有文字记载、依凭口头流传的《苗族古歌·跋山涉水》中唱道:“从前五支奶,居住在东方;从前六支祖,居住在东方……”。“五支奶”、“六支祖”为探寻苗族族源的形成提供了线索。

据《史记·五帝本纪》载:“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泰山);西至于空桐(在陇右);南至于江,登熊湘(湘山);北逐荤粥(匈奴别名),合符釜山(在今河北怀来县)。”“开国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黄帝战败了许多部落,最后在涿鹿之野即河北涿鹿县境内把蚩尤为代表的一群氏族部落打败了。这群氏族部落是近代汉藏语系中苗族和瑶族的祖先。

楚辞《离骚》有句曰“帝高阳之苗裔兮”,许多学者指出楚之先人为苗族,这还需进一步探讨。但长江流域的“蛮人”,淮河流域的“夷人”以及华夏诸侯的国人相互融合,长期交往,创造了绚丽多彩的楚文化,这是人们公认的事实。公元前五百二十年,周景王时,王子朝争王位,经四年战败,便率召氏、毛氏、

尹氏、南宫氏等旧宗族(自然也有百工),带着王宫所有的典籍逃奔到楚国。《后汉书·南蛮传》载:秦昭王时(公元前三〇六年至二五一年),“使白起伐楚。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直到秦统一中国时,苗族部落仍聚居在黔中郡,即今湘西、黔东一带。

从考古资料看,我国是远古人类发展的重要地区。大约从一百万年以前,在云南元谋,在北京周口店,在山西芮城等地,在贵州黔西的观音洞,在河南三门峡和湖北大冶等地,已经发现了远古人类的遗骸和遗物,证明他们已经劳动、生息、繁衍在祖国的土地上。以后又经过漫长年代,从母系氏族公社过渡到父系氏族,从蒙昧时代过渡到野蛮时代,在六七千年前,以牧羊为主的羌人部落,从西北的甘、青、川交界的高寒山区分批下到肥沃广坦的黄河中下游平原,适应环境生存和发展,在这一地带出现了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相比之下,黄河中下游地带多为洪水沼泽,原始居民极少,尚未发现史前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而山西及陕北高原已分布许多旧石器时代遗址。同时陆地的洪水使海水上升,吞没了今渤海地带,也促使东夷民族从山东半岛的山区向西发展,他们在山东和苏北形成了青莲岗文化和大汶口文化。

由西羌的炎黄所组成的华夏联盟,首先分裂成为姬姓的黄帝轩辕氏和姜姓的炎帝神农氏、蚩尤有苗氏;由东夷的人夷、风夷(鸟夷)组成的人风联盟,分裂成为风姓的太昊伏羲、嬴姓的少昊金天氏、姚姓的帝舜有虞氏。这已是原始社会末期。黄帝和炎帝分居姬水和姜水,又在由西北向中原的移迁过程中,组成炎黄部落联盟,控制了少昊氏的活动地区。在考古学范围内,炎帝、黄帝时期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

龙山文化遍布于黄河中下游,也影响到了上游地区,形成山东、河南两个中心。大量资料证明,在龙山时期已有了发达的锄耕农业和家畜饲养业,手工业成了独立的生产部门,商品交换也有了扩大,金属冶制业已经发明。

特别突出的是,我国从 1959 年以来陆续发掘出土的大汶口型文化,是父系氏族社会文化的见证,已经形成一个系统,有遍布于古代黄河下游的南岸和淮河下游的两岸的少昊文化的历史遗存。

大汶口文化系统脉络分明,内容丰富,延续的时间很长,它展示了古代东方部族在渔猎经济之后,手工业与农业相分离的社会生活面貌。

实际上,炎族先民有姜姓一支,为太昊氏的后裔。据《后汉书》载:“西姜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又据《周易·系辞》:“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为本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说明在神农氏时已进入农业时代。神农氏又号“太昊氏”,姜姓是神农氏的一姓,三苗又是姜姓中的一支,神农氏除姜姓一姓外,还分为州、甫、甘、许、戏露、齐、纪、怡、向、申、只等,这些姜姓的分支,直到春秋时候还存在。

在大汶口文化中,从出土遗物来看,各式骨器占 47%,在比重上大于石器(占 41%),还出现了大量的动物骨骼,说明畜牧业已居于一定的地位。在遗址中,发现有高达 1.2 米的动物骨骼大量堆积和大量的专用酒器,出现木椁和大量随葬的猪头骨,很像后来“交木作为椁,杀猪积其上”的葬法。猪的繁殖和饲养已较为普遍。这“对于人类心灵启示了最早的财产观念。从随葬品的多少、悬殊,各式贵重装饰物(包括玉器、透雕

牙器、绿松石银嵌器等)的专门制作,白陶工艺在用料方面的重要突破上,集中表现了当时社会生产已经划分为农业、手工业,有了财产的差别。其文化的精美造诣,主要代表父系氏族社会第二次大分工前后的水平。其文化性质,前期的造诣和仰韶文化、青莲岗文化晚期基本相当,晚期正在向龙山文化过渡,但已经超出龙山文化的水平。”^①

从族源上探寻,楚族长期在睢山和荆山之间拓展。从新石器时代以来,楚国国都丹阳一带,就在黄河流域的古代文明与长江流域的古代文明交汇之处。仰韶文化向南伸展,及于鄂西北。较晚的屈家岭文化(有的学者提出即为三苗文化的主体),向北伸展,及于豫西南。更晚的河南龙山文化,又伸展及于鄂西北。我国考古学界于1958年至1962年发掘的湖北郢县青龙泉遗址,下层属仰韶文化,中层属屈家岭文化,上层是带有龙山文化特征的石家河文化,其迭压关系正是南北文化彼此激荡的地下实证。

分布在山东、河南、河北三省交界地带的九黎,相传它的首领蚩尤“兄弟八十一人”,这里的蚩尤根本不像是个“古天子”,所谓“兄弟八十一人”应当是八十一个氏族。

苗族在夏代没有文字记载,史迹不详。但是,在夏殷之际,称姜人为羌人。把“姜”字改为“羌”字,首见于《商颂·殷武》,“自彼氐羌”。羌字的交换,与姜族自称,并无异义。如前所说,成汤代夏,建立商朝,氐羌两族才见于史迹。五十年代初期,中国考古学者在河南郑州市二里岗等地,找到了商代前期的文化遗址,证明商朝从建立开始就已经处于文明时代,二里头文

① 邹衡:《关于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文物》1979年第3期。

化是夏朝所属的考古学文化即夏文化,是一个更早的文明演进阶段。目前二里头文化遗址中,仅是山西复县东下冯发现两道壕沟,尚未发现城址。早于二里头文化,龙山文化已发现五处小型城堡遗址。晚于二里头文化,早商文化已出现郑州商城和偃师尸乡沟商城大型都城遗址。处于二者之间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应该也有中型城址的存在。偃师二里头遗址总面积已超过 300 万平方米,与郑州商城的大小相若。在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发现成组的宫殿群基址,不少二里头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青铜器。二里头文化中还发现单个字,这些字都刻在陶器之上,从结构来看,同甲骨文已经非常接近,应为当时文字的留存。当然,二里头文化中的不少因素已在龙山文化中滋生,却有商周文明的质变。这是中国文明的源头。对于苗族先民的历史也会影响和渗透。

总之,我们在研究苗楚的亲缘关系时,由于古文献不能视为当时文字记录的直接证据,专家们一般都将尧、舜、禹以及以前的黄帝等归入古史传说时代。这需要继续不断地有考古资料的发掘以作科学的说明。

第二节 苗族的民族渊源

今天的苗族主要分布区提供了寻求苗族族源的重要依据。在我国,苗族居地分散,一般以方言的差别而分为中、东、西三大方言区:中部方言区以黔东南、黔南为主,延及黔西南、桂东北、湘西南、海南岛等地;东部方言区包括湘西和黔东北、川东南、鄂西南;西部方言区包括贵阳迤西至滇黔川边,以及

滇东、滇南等广大地区。

现在的中部、东部和西部三支苗族与古三苗之间的关系怎样，是寻求苗族族源的中心所在。

古三苗的存在确定无疑。《尚书·吕刑》曰“三苗，九黎之后。盖黎与苗，南蛮之名，今日犹然”，“齔寡有辞于苗，……降咎于苗”；《益稷》曰“苗顽弗即工”；《舜典》曰“窜三苗于三危”；《皋陶谟》曰“何迁乎有苗”；《大禹谟》曰“苗民逆命”等。三苗、有苗、苗民异名而同实。

古三苗是今三苗的先民，而古三苗的先祖应是神农伏羲。湘西苗族流传的民族史诗《跳龙歌》中有所反映。苗族先民的古史可分作“开天立地”的太古期、“前朝”的太古中期和“后换”的上古期。《跳龙歌》中的主要人物侬僊，汉人尊称为太昊。《帝王世纪》载：“太昊帝庖牺氏……取牺牲以充庖厨，故号曰庖牺。”庖牺、宓牺、炮牺等音义相通，亦即伏羲，又是最早最有贡献的神农一皇。又载：“太昊帝庖牺氏风姓也，蛇身人首……。”《山海经》载：“南方……有人曰苗民，有神鸟人首蛇身……名曰延维。”古三苗以龙为图腾，而伏羲女娲都被苗族当作最早的先祖，湘西苗族在“还傩愿”的活动中，所供奉的傩公傩母神像，据说就是伏羲女娲。

盘瓠的神话亦与苗族先祖有关。盘瓠神话较早见于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但该书已佚。李贤注《后汉书》引该书《南蛮传》的条目曰：“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南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赠黄金千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彩，名曰盘瓠。下令之后，盘瓠遂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头也。……帝不得已，乃以女配盘瓠。盘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止石